持续了近一个月的欧美同学会百年庆典虽已落下帷幕，但是关于海归人才的话题依旧热度不减。近日，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欧美同学会联合主办的“‘海归·中国梦’论坛暨《影响中国——20位顶尖海归访谈录》新书首发仪式”上，围绕着“当下需要什么样的海归人才”这一话题，多位嘉宾畅谈了各自的看法。

海归怎样再续百年报国辉煌——

3类人才最急需

玄增星　舒　鹏

选择1　基础理论研究人才

基础理论研究是学术发展的根基，它以高度的概括性、系统性、普遍性指导着实践活动。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中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会长徐昌东说：“引进基础理论人才是当务之急。”他表示，国有企业在之前的人才引进方针上采取实用优先的原则，大批引进实用型人才，却忽视了基础领域研究方面人才。而中国想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的角色转变，必须在基础知识领域加强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这也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拥有强大软实力的国家才真正算得上是一个强国。

据了解，我国从事基础理论研究人才的数量并不少，然而其中能够做出真正推动人类发展研究成果的人却凤毛麟角。以科学领域为例，著名生物学家、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饶毅认为，目前我国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还很不足，对人类知识的实质性贡献依然十分有限，一个明显的判断标准就是教科书中收录的由中国产出的知识还很少。”饶毅说，“理论知识上的欠缺直接限制了我国的自主科技研发，进而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进程。因此,国家应对基础理论研究的人才给予更多的重视。”

选择2　高新技术研发人才

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步至今，已经成为拉动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火车头。然而，我国的高新技术研发人才缺口始终较大，培养和引进这批人才一直是国家和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

说到我国如此缺乏高新技术研发人才的原因，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上海长森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喆认为，这与目前总体浮躁的科研环境有关。“许多做科研的海归回国之后，都被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一系列的指标、任务，也就是所谓的‘短、平、快’项目。在这种情况下，科研成果的质量就比较难保证。”王喆建议，“国家应该给科研项目更多的时间，不能只看重短期效益，应将眼光放长远，让科研人员能够沉下心来认真从事研发工作。”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北京全景赛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CEO陈忠苏提到，目前他的公司在研发层面上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技术的本土化。“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差异，有时从国外引进的技术在国内很难落地，这就需要研发人才将技术与国内环境紧密结合起来。”陈忠苏说，“因此我认为在技术研发上，本土人才国际化和海归人才本土化这两方面的人才培养都需要落实。”

选择3　高层次管理人才

香港铁路中国业务首席执行官易珉在“海归·中国梦”论坛上提到:“一个社会的进步要靠技术的革新来推动,而一个社会的品质则要靠管理来维系。”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中国将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并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无论是与海外联系紧密的跨国企业,还是具有外向型功能的国家部委,具有国际视野、经验丰富、知己知彼的海外高层次管理人才都拥有充分发挥优势的巨大空间。

目前，国内企业为这类人才提供的发展空间还不够广阔。“拿产品立项来说，很多国内企业都认为产品有市场才能立项，一些最新研发的产品因为缺乏市场需求的证明而得不到立项机会，很可惜。”王喆说，“比如我们一直在从事研发的胰腺癌药品，目前市面上还没有这类药物，但是市场需求是肯定存在的。如果因为立项问题而延误了药品的研发，将会是巨大的损失。所以培养和引进具有广阔视野和长远目光的高级管理人才是企业的重要任务。”

而除了企业，公务员队伍同样需要这类具有国际沟通合作能力的高级管理人才。欧美同学会商会副会长、中国诚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立群认为：“目前，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按政策国家要给予他们回国开展研发创业等活动的启动资金支持，国家相对投入的成本较高，而公务员队伍领域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只要在户口办理、养老医疗、配偶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即可，无需投入研发创业启动资金。节省的资金可以用于吸引更多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

渴求高层次人才

齐　心

数量不能简单等同于质量。随着新一轮“归国潮”的到来，我国的海归数量与日俱增，但海归人才群体层次不均衡,高层次海归人才比例低是主要原因。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高层次海归人才一般是指：公派或自费出国留学，学成后在海外从事科研、教学、工程技术、金融、管理等工作并取得显著成绩，为国内急需的高级管理人才、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学术技术带头人，以及拥有较好产业化开发前景的专利、发明或专有技术的人才。而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人才、高新技术研发型人才和高层次管理人才最为国家所需。

一方面是海归人士的数量很庞大，一方面是国家发展仍渴求真正人才，如何消解这种矛盾？近年来，国家切实推行“人才强国”战略，推出“千人计划”引进了一大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专家为国服务。对于海归来说，不少人认为拥有海外留学经历或者学习热门专业就能为自己“镀金”，其实不然。成为国家真正需要的高层次人才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坚持不懈的毅力和不畏艰难的勇气。从“千人计划”专家的成长历程来看，他们成为国家所倚重的高层人才，无一不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不断探索的结果。他们沉得住气,耐得住苦,从现实需求出发,不断学习、总结、发现、创新,进而引领了行业的潮流,不仅成就了自己的事业,更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留学归来依然扎堆“北上广”　择业成功还需心态“接地气”

本报电　中国庞大的市场给海归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催生出新一轮的人才回流潮。据统计，近10年来，我国留学回国人员累计达93.78万人，其中，有约80万是近5年的回国人员。

根据最新调查，海归在择业时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主要就业地区覆盖我国15个省市，其中，有41.6%的海归选择在北京就业，14.2%的海归选择上海，8.7%的海归选择广州。此外，江苏、浙江、山东等沿海省市也获得了不少海归的青睐。但是，人才扎堆并不意味着高收入。77.5%的海归表示自己现在的薪资水平低于预期，其中，33.8%的海归认为薪资比预想的低很多。同时，有13.7%的留学人员归国半年后仍未找到工作。

在人才竞争的全新时代，留学人员归国后，心态“接地气”很重要。业内人士建议，相较于人才需求较为饱和的一线城市，中西部许多二三线城市有着自身的优势，海归人员在择业时，不妨多“接地气”，多做考察，更多地放眼中西部城市。　（刘　桔）

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希望广大留学人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内引外联、牵线搭桥，当好促进中外友好交流的民间大使。那么，对于海归来说，在做民间文化外交时会遇到哪些问题？怎样来解决这些问题？记者就此采访了长期致力于中韩文化交流的中韩友好协会理事艾曙光和尔湾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周怀北。

民间文化外交

身份认同更重要

李书娜

民间外交缺乏话语权

从美国博士毕业后，周怀北回到自己的家乡武汉创办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主要经营电子学术期刊，希望通过学术交流，让中国与世界实现在思想上和文化上的无障碍交流。但政府与社会的不认同使他的学术交流工作做起来很困难。

“虽然，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国际上已经有一定地位，但是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与我们的经济地位是不相符的。我创办这个公司,就是想从学术上提供一个客观、公正的传播中国声音的平台。但政府和社会的不认同是我们目前最主要的困难”。目前,周怀北的电子期刊已是全亚洲第一,但其公司的英文期刊,90%的投稿却是来自国外的。

同样，1999年去韩国留学，回国后创办中和文化传播公司，做了20年中韩文化交流的艾曙光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在韩国，国家形象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有一个专门的国家形象委员会，直接归总统管。而我们国家的文化交流很多是文化部或者更下面的部门管。由于地位不高，我们在做文化传播交流时就会感到‘人微言轻’，不能主动掌握话语权。”

据了解，每年经文化部批准的中外文化交流项目就有几千起,覆盖六七十个国家。这些项目主要包括音乐节、书画展以及在世界各地举办的“中国年”活动等。而这些活动大多是以政府部门为主进行的。

从政策上增强身份认同

那么，对于民间文化外交中存在的“人微言轻”这一情况，应该怎么解决？两位受访者都表示，现在他们所做的文化交流大部分是靠一己之力，希望政府从政策、法律、财政上予以支持，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对“民间外交”身份的认同。

周怀北说：“我的学术网站西方国家都承认，而在中国却得不到认同。希望政府给民间企业相应的权利和政策支持，在政策上进行引导。政府对我们身份的一个认同，将会对文化传播交流起到鼓励促进作用。”

“我每年花1/3的时间做中韩民间文化交流，通过自身去影响别人。但个人的力量毕竟很微弱，这就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对民间外交给予足够的重视。比如，在政策上，承认留学人员是非常重要的民间外交力量；在法律上，对‘民间外交’身份给予认同，这样就使得我们更有话语权，在对外交流传播时说话更有分量。”受访者艾曙光如此表示。

最后，两位受访者都强调，相对于资金的支持，政府从政策上对从事民间外交的人或公司予以承认并给予重视，是更重要的支持。

贾巍：说相声不亦乐乎

仲芳芳

相声是我国传统的民间曲艺,深得男女老少喜爱。相声演员给你说上一段，够你乐半天。随着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选择留学海外,他们在留学期间也把相声带到了当地。贾巍就是中国相声的海外传播者之一,他不仅自己迷相声,还在留学新加坡的几年中,把相声带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让许多当地人士渐渐地也迷上了相声。

结缘相声

贾巍长得很清瘦，但有一股精神劲儿。提到相声，他一口纯正的北京话滔滔不绝：“我爱说相声。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从小就受到老北京文化的熏陶。奶奶是老北京人,喜欢看戏(京剧),听相声。那个年代娱乐活动很简单,就是听听收音机,看看电视。我说相声完全是自学。奶奶听相声的时候,我也听。慢慢地,我也就开始说起相声了。”

左一为贾巍

“父亲买了很多的相声带子，我记得有马季，赵炎的，还有像二赵的《学四省》、《相面》，李金斗的《武松打虎》等。中午放学回家吃完午饭，‘空中笑林’是一定要听的。有时候，因为听相声，下午上学还迟到了。后来就慢慢地跟着他们学起来。”

新加坡的相声岁月

贾巍高中毕业后头几年并没有过多地接触相声，直到后来他到新加坡南澳大学留学，攻读三年制的工商管理。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他结识了他的师父张志强。“我是在新加坡认识师父的。我遇见师父后，把丢了几年的相声又重新拾起来了。师父那时候在新加坡经常有演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一些地方，喜欢相声的人也很多，有很多当地人，也有中国留学生，他们有的还组成自己的相声圈子，定期地组织相声活动。”贾巍说。

后来，师父张志强在新加坡的演出结束了，回了北京，贾巍则留在新加坡继续工作。过了不久,他觉得相声在新加坡的发展受到了很多的局限。“相声起源于中国,在语言上首先就会受到局限,这也是很自然的现象。后来我们在新加坡说相声的时候,会把新加坡的一些语言元素放入我们的段子当中,这样听的人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

回国后相声依旧

虽然在新加坡说相声也有一些听众，但由于语言、文化、信仰等方面的差异，贾巍还是决定回国，回到北京。“那天是大年三十，飞机票非常不好买，但是特别想回到中国，几经周折才买到了回国的票。虽然还要从香港转机，但毕竟还是回到了国内。”贾巍动情地说。

回国后，他和几个朋友合伙，创立了“嘻哈包袱铺”相声机构。“刚开始的时候，来‘嘻哈包袱铺’的人不是很多。那个年代的营销手段不像现在这么多样，我记得我当时只是在网络上刷帖子做宣传。后来听我们说相声的人越来越多，有时甚至火爆到一票难求。那个阶段，我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嘻哈包袱铺’上，相声就是我的事业。”

后来，由于个人原因，贾巍从包袱铺里退了出来，但相声还是他的副业。“虽然退了出来，但平时的演出我还是会去出场，虽然不再是全职相声演员，我还是对相声充满了热爱。”贾巍说。